

北京图书馆藏宋版书叙录之（十七）

李致忠

《说文解字》十五卷 汉许慎撰 宋徐铉等校定 宋刻元修本 每半叶十行，行大字十六至十八字不等，注文小字相间不等，白口，左右双边。

许慎字叔重，汝南名陵（今河南郾城）人。大约生于东汉明帝永平元年（58），卒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享年九十岁。《后汉书·儒林传》谓许慎“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校长。”尝师事贾逵，曾任太尉南阁祭酒。许慎博通经籍，精于文字训诂之学。尝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而撰《五经异义》十卷，专主古文经学。后来郑玄不全赞成其说，又撰《驳五经异义》一书，对许书加以驳难。又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著《说文解字》十四卷，并叙目一篇为十五卷，为后世文字学研究和字书编辑留下了开山之作。

《说文解字》成书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这一年许慎四十三岁，年富力强，才思敏赡，学业精熟，故其所著书亦造诣精深。《说文解字》凡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又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个，注文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字。按文字形体及偏旁构造，分列为五百四十部，首创部首编排的方法。字体以小篆为主，有古文、籀文等异体，则列为重文。每字下有注释，大抵先

释字义，再释形体构造及音读，依据六书来解说文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字形和考究字原的字书，也是世界上最古的字书之一。

然其“训诂简质，猝不易通；又音韵改易，古今异读；谐声诸字，亦每难明，故传本往往讹异。宋雍熙三年，诏徐铉、葛湍、王惟恭、句中正等重加刊定。凡字为《说文》注义序例所载，而诸部不见者，悉为补录；又有经典相承，时俗要用，而《说文》不载者，亦皆增加，别题之曰新附字；其本有正体，而俗书讹变者，则辨于注中；其违戾六书者，则别列卷末；或注义未备，更为补释，亦题臣铉等案以别之；音切则一以孙愐《唐韵》为定。”（《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这就是说，自《说文解字》问世，至北宋雍熙三年（986），已历经八百余年。人们对《说文》的简单训释，已难以通晓。历时既久，音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又产生了古今不同的读音。各谐声诸字，也很难明晓。所以各种传本也就往往产生讹异。有鉴于此，中书门下曾于雍熙三年奉旨发下牒文，谓“许慎《说文》起于东汉，历代传写，讹谬实多，六书之踪，无所取法。若不重加刊正，渐恐失其源流。爰命儒学之臣，共详篆籀之迹。右散骑常侍徐铉等，深明旧史，多识前言。若能商榷是非，补正缺漏，书成上奏，克副朕心，宜遣雕镂，用广流布。自我朝之垂范，俾永世以作程。其书宜付史馆，仍令国子监雕为印版，依《九经》书例，许人纳纸墨价钱收赎。兼委徐铉等点检书写雕造，无令差错，致误后人。”

从这道牒文看，从负责校定，到点检书写、雕造，都是由徐铉领衔的。考徐铉，字鼎臣，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生于五代后梁贞明三年（917），卒于北宋太宗淳化三年（992），享年七十六岁。徐铉十岁能属文，不妄游处，与韩熙载齐名，江东谓之“韩徐”。尝仕吴，为校书郎。又仕南唐李昇父子。归宋，官至散骑常侍。与弟徐锴齐名，号称“大小二徐”。徐铉性简淡

寡欲，质真无矫饰。不喜释氏而好神怪。精于小学，好李斯小篆，臻其好。隶书亦工。所以他受命与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共同校定《说文》，并始终处于领衔地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他在接受这项重任以后，确也严肃认真。正如他在《新校定说文解字》序中所说：“臣等敢竭愚陋，备加详考。有许慎注义序例中所载，而诸部不见者，审知漏落，悉从补录。复有经典相承传写及时俗要用，而《说文》不载者，皆附益之，以广篆籀之路，亦皆形声相从，不违六书之义者。其间《说文》具有正体，而时俗讹变者，则具于注中。其有义理乖舛，违戾六书者，并列序于后，俾夫学者无或致疑。大抵此书务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违古。”可见徐铉于《说文》的校定，是科学地分别各种情况，审慎地加以补校的。所以自北宋以降，《说文》之流传，盖以徐校本为主了。

前引雍熙三年中书门下牒文已谓：“其书宜付史馆，仍令国子监雕为印版。依《九经》书例，许人纳纸、墨价钱收赎。兼委徐铉等点检书写雕造，无令差错，致误后人。”可见经徐铉等奉敕校定的《说文解字》，其最早刻本是雍熙三年（986）徐铉亲自点检书写上板由国子监开雕的。之后，由于它是小学中的最重要的字书，故一刻再刻，以敷应用。今北京图书馆收藏两部宋刊本，便是宋时一刻再刻的实例。其中一部宋刻元修本，带有丁晏跋文。另一部亦是宋刻元修本，行数虽与丁晏跋本相同，但大小字数有异。还有一部残帙，仅存卷四下至卷五上及卷七，凡三卷，盖与丁晏跋本相同，亦题为宋刻元修本。

丁晏跋本各卷卷端首行顶格镌：“说文解字卷第×上或下”；下题“汉太尉祭酒许慎记”；二行低二格镌：“银青光禄大夫守右散骑常侍上柱国东海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徐铉等奉敕校定”。行格适度，字体严整，刀法稳健，端庄古朴，墨色纯正，有明显的补版。版心上记大小字数，下记刊工姓名。除卷一上“祯，祥

也。从示贞声。”贞字缺末笔，以示避讳外，其余如慎、蜃、敬、竟、铉、树、莞、让、嚮、弘、构、媾等字均不避讳。前人曾据此定此书为北宋刻本。考“贞”字缺笔，回避的当是北宋仁宗赵祯的名讳，而其以后帝讳均不回避，是刻于北宋仁宗之时似不无道理。然细检该书卷六，其“桢”字注文谓“刚木也，从木贞声”中的“贞字却又不缺末笔，表明仁宗的名讳又不行回避。故断其为北宋刻本，根据又极其不足。

此本递经名家收藏，印记琳琅，计有：“虞山毛氏汲古阁收藏”、“臣晋”、“海虞毛表”、“奏叔图书记”、“古吴毛氏奏叔图书记”、“中吴毛叔子收藏书画印”、“御史振宜之印”、“季振宜印”、“沧苇”、“季因是珍藏印”、“苏斋桂馥之印”、“阮元印”、“肇经老人”、“姚琬”、“姚氏伯山”、“新安汪灝藏本”、“竹农珍赏”、“延令戴大章字□□一字南轩”、“大章”、“尧声”、“戴大章印”、“绿柳桥西戴大章”、“延令戴大章别字南轩”、“葉志诜”、“东卿过眼”、“顾广圻印”、“敬思斋图书记”、“净香室秘玩”、“古秋堂”、“额勒布号约斋”、“额勒布印”、“鄂尔崐徽佳氏藏书记”、“约斋鉴赏”、“约斋审定”、“曾为徽佳氏约斋所藏”、“鄂尔崐”、“徽佳氏”、“五峯宝奎之章”、“宝奎号五峯”、“五峯珍藏”、“五峯藏书记”、“宝三书屋”、“绿筠清画轩”、“许翰之印”、“何绍基观”、“何绍业观”、“汪喜孙印”、“孟慈”、“扬州汪喜孙孟慈父印”、“陈庆镛颂南”、“季子庆镛”、“芝叔”、“东郡杨氏”、“杨氏海源阁藏”、“以增之印”、“杨绍和藏书”、“四经四史之斋”、“祁阳陈澄中藏书记”、“陈印清华”、“澄中”、“周暹”等印证。

上述诸家，几乎都是有名的藏书大家，于此书赏鉴玩味，视为珍宝，从上述藏印中可以窥见。但谁也没有细考此书，将此书版本定得更确切些。丁晏于道光十八年（1838）得到此本之后写

下一道跋文，谓：“道光戊戌四月初六日，孟慈户部以宋槧小字《说文》见示。余究心许书廿年，得见斯书，良可庆幸。其中亦有误字，然因此可以考见原文，不似近刻臆改许书，失去本来面目，是可叹也。山阳丁晏记”。这篇跋文没有多高的学术价值，除说出一句“宋槧小字《说文》”外，其余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话。

此书后归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海源阁第三代主人杨绍和也写了一篇题识，谓：“近时汲古阁本、平津馆本、藤花榭本，皆依宋槧开雕。汲古阁本行字不同，而此本毛氏之印累累，当亦为汲古所弄。至延令书目著录之《说文》六本及藤花榭所据之宋槧，即此本也。《百宋一廬》，所载小字本，款式无异，不知同出一版否。但彼多钤叶，此则究帙耳。向藏江都汪容甫先生家，其哲嗣孟慈太守官豫中，适先公分巡大梁，订交最密，太守因以此本为贄。时道光之辛丑、壬寅间也。咸丰壬子重装于南清河节署。越十年同治壬戌东郡杨绍和彦合识。”毛氏汲古阁所藏宋槧《说文》不是一种，其所据以重刻而行世者，今北图亦有收藏。检出与之相勘，知确非出自此本。然此本毛氏印记颇多，故杨绍和推断亦为汲古阁所收藏，此论不诬。平津馆孙星衍、藤花榭额勒布及延令戴氏书目所录之重刻的《说文解字》，依据的就是此本，也就是今天藏于北京图书馆、本文所评介的这个版本。这一点杨氏持论亦确，但这个本子究竟为宋代何时何地所刻，仍未言及。北京图书馆在一九五九和一九八九年所出的两部善本书目中，也仅著录为“宋刻元修本”，亦未及深考。这样，关于此书版本前人鉴定的意见而可资借镜者，也就仅此而已。日本静嘉堂藏有此本，定为北宋刻南宋孝宗时修补本，恐亦不确。

考此本刻工，有弓华、王太、王文、史伯恭、平山、吴中、吴玉、吴祐、李祥、李宝、沈祥、良富、周明、金大明、范坚、茅化、孙元、徐咏、曹荣、曹德新、陈琇、陈新、陈宁、杨十

三、杨春、詹世荣、詹德润、顾达、曹鼎、齐明等。其中王文是南宋初期杭州地区的名工，曾于绍兴十九年(1151)参与刻过《毗卢大藏》；嘉定十年(1217)又为南康道院刊印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足见此人毕生从事刊板工作，而且工作的时间特别长。吴祐在南宋初年参与刻过单疏本《尔雅疏》。嘉定后又参与杭州重刊北宋熙宁吕夏卿校本《荀子》的工作。吴中在南宋淳熙年间参与抚州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经典释文》及桐川郡斋刊《史记》的雕板工作。李祥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参与刊印过《备急总效方》，还在南宋初年参与刊印过单疏本《尔雅疏》，又参与过庆元六年(1200)绍兴府刻八行注疏本《春秋左传正义》的补版工作。周明也是南宋初期杭州地区的名工，并参与庆元六年绍兴府八行注疏本《春秋左传正义》的开雕工作。可见这二人也是多年从事雕板的良工。詹世荣、曹鼎也都是南宋初中期杭州地区的刻工。这样一批刻工同时出现在《说文解字》上，说明此本《说文解字》当亦刻在南宋初期的杭州地区。

其他如弓华，在元朝至大年间曾参与刻过《书学正韵》。史伯恭是宋元之际的刻工，在元朝曾参与宋两浙庾司刊本《礼记正义》、宋庆元六年绍兴府刊本《春秋左传正义》的补版工作，而这两书今天均藏于北京图书馆。平山在元朝参与刻过《六书统》。李宝、沈祥、良富、范坚、茅化、陈琇、杨春、齐明等，也都在元朝参加过补版和刻版工作。如陈琇，是元朝杭州地区的刻工，他曾参与宋庆元六年绍兴府刊八行注疏本《春秋左传正义》的补版工作。杨春参与刻过元至正五年(1345)江浙刊《金史》。齐明在元大德年间参与刻过《礼记集说》。这样一批刻工又同时出现在《说文解字》上，表明此本《说文解字》其版片到元朝又经修补重印过。综合上述两批刻工的时代属性，则此本《说文解字》的版本似可著录为“南宋初期杭州地区刻元代杭州地区修补本”。

《说文解字》正文凡十四篇，合序目一篇，共为十五篇，亦即十五卷，然以篇帙繁重，每卷又各分为上下，所以又有三十卷之谓，如《四库全书》本《说文解字》，就著录为三十卷。实则仍是十五篇。

《新集古文四声韵》五卷 宋夏竦撰 宋刻本（卷一配清抄本） 每半叶六行，白口，左右双边。

夏竦字子乔，江州德安（今江西九江）人。生于北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卒于北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享年六十七岁。其父夏承皓，尝于太平兴国初年上《平晋策》，得补右侍郎，隶大名府。契丹内寇，承皓间道发兵，夜与辽兵遭遇，力战而死。表赠崇仪使录其子竦为润州丹阳县主簿。竦资性明敏好学，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乃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景德三年（1006），即夏竦二十二岁那年，得举贤良方正，擢为光禄寺丞。通判台州，召直集贤院，充国史编修官，判三司都磨勘司，累迁右正言。帝幸亳州，为东京留守推官。宝元二年至庆历元年（1039—1041）间，出任陕西经略安抚使。但又怯于对西夏用兵，故自请解除兵柄，改判河中府。庆历三年（1043）又名为枢密使，因谏官反对，则改知亳州。庆历七年（1047）任枢密使，不久又为御史论罢。仁宗初，由于王旦的举荐，曾教书资善堂。不久又同修起居注，为玉清昭德宫判官，兼领景灵宫会真观事，迁尚书礼部员外郎，知制诰。国史成，迁户部。景灵宫成，又迁礼部郎中。夏竦为人尚权术，性贪婪，世人目为奸邪。然文章典雅藻丽，为世人所推重，故卒谥文庄。有《文庄集》行世。

其编撰《古文四声韵》的缘起与经过，虽在汪立名的《汗简序》、王应麟《玉海》、《中兴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很多著作中都有所描述，但又都失于文字简略，看不出全豹。唯一说得较为详尽的，还是夏竦于庆历四年（1044）进呈此书时所写的序言。序谓：“……圣宋之有天下，四海会同，太学博士

周之宗正丞郭忠恕首编《汗简》，究古文之根本。文馆学士句中正刻《孝经》，字体精博。西台李建中总贯此学，颇为该洽。翰林少府监承王维恭写《读古文》，笔力尤善。殆今好事者，传识古文科斗字也。臣逮事先圣，久修史官。祥符中，郡国所上古器，多有科斗文，深懼顾问不通，以忝厥志。由是师资先达，博访遗逸，断碑蠹简，搜求殆遍。积年逾纪，篆籀方该，自嗟其劳。考有散坠。遂集前后所获古体文字，准唐《切韵》，分为四声，庶令后学易于讨阅。仍条其所出，传信于世，字有阙者，更俟同志相续补缀。此者伏遇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皇帝陛下缉熙百度，宣精六易。法唐尧之稽古，迈商宗之典学，多能攸纵，小善不遗。猥锡宸旨，特令进御。臣久役废书，积忧伤目，数四校讎，尚虞舛误，干冒宸戾，伏增惶越。庆历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推诚保德翊戴功臣开府仪同三司行吏部尚书知亳州军州事管内河堤劝农使兼管勾本州驻泊军马公事开治沟洫河道事上柱国九江郡开国公食邑捌仟肆百户食封贰仟陆佰户臣夏竦谨序进。”

这段序文反映了夏竦编撰《古文四声韵》的缘起经过：盖前人虽多有古文字方面的力作，但均检阅不便。且当世好事之人，又常传识科斗之文。祥符间（1008—1016）郡国所上之古彝器，其上亦多有科斗之文。而自己又尝教书资善堂，久修史馆，事先圣于左右。面对这些古文科斗又深恐顾问不通，以忝厥职。故而师资先达，博访遗逸，断碑蠹简，搜求殆遍。且积年逾纪，篆籀皆备。又遇当今陛下缉熙百度，宣精六艺，法唐尧之稽古，迈商宗之典学，多能攸纵，小善不遗。遂集前后所获古体文字，依据唐代所补《切韵》，分为四声，庶令易于讨阅。并条其所出，传信于世。可见夏竦编撰《古文四声韵》，完全是他当时的工作需要，而并非无病呻吟。书成之后，又特令进御，足见当时还是深得器重的。

然至清代全祖望，却谓此书“以校郭氏《汗简》，未尝多一

种。其实即取《汗简》而分韵录之，无他长也。盖《汗简》之部居一本《说文》，而是书则本《广韵》，乃绝无增减异同。于《汗简》则是书虽不作可也。”（全祖望《埼觔亭集》卷三十一）《汗简》乃郭忠恕所为。郭忠恕字恕先，又字国宝，洛阳（今属河南）人。五代后周广顺中（952）召为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入宋官国子主簿。工画山水，尤擅界画。精于文字学，善写篆书、隶书。著《佩觿》三卷，以阐明文字的变迁，考证传写的错误。又汇编古文字为《汗简》，是后世研究古文字的重要参考书。“以校郭氏《汗简》”，指的就是以夏竦《古文四声韵》来和郭忠恕的《汗简》相比较。比较的结果是，《古文四声韵》所引书，较《汗简》未多一种，绝无增减异同。实际上只是将《汗简》所收之字分韵录写，绝无他长。全祖望因而结论，对于《汗简》来说，则夏竦之《古文四声韵》不作可也。这显然是一种尖锐的批评。

然汪立名《汗简序》却说：“郭宗正《汗简》见《宋史艺文志》，与《佩觿》并列。自夏英公集古文韵而下，凡小学之书无不援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谓全氏“其说固是，然《汗简》以偏旁分部，而偏旁又全用古文，不从隶体，猝不易寻。此书以韵分字，而以隶领篆，较易于检阅。此如既有《说文》，而徐锴复作《篆韵谱》”相辅而行，固未可废其一也。”这些评论又显然是公允的。因此，此书自问世以来，光在宋代就一刻再刻，流布甚广。且其所引遗书八十八家，实为留存古文献之功臣也。

此书著录见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博采古文奇字，分四声编次，以便检寻。”足见此书北宋当有刻本流行。然北宋雕印此书，最早不会早于庆历四年。原因是这一年的二月夏竦才编竣此书，并序以进览。

关于此书的宋刻本，元朝的吾丘衍在其《学古编》卷下有过

如下的描述：“夏竦《古文四声韵》五卷，前有序并全御者好。别有僧翻本者，不可用。此书板多，而好者极不易得。”吾丘衍，一作吾衍，本衢州人，家于杭州钱塘。字子行。嗜古好学，通经史百家言。操行高洁，不求荣进，隐居教书，人称贞白先生。他生当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卒于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是元朝初期的人物。他所生活的元朝初年，识见宋版书既多且易。其谓夏竦《古文四声韵》刻本虽多，但珍好者极不易得。其比较甄别的结果，认为此书前边带有夏英公自序并全御者好。所谓全御，就是指夏竦衔名全具者。简言之，就是在众多传本中，仅带有夏竦自序及题名冠以全衍者为好版本。另外还有僧人翻刻的版本，最差，不可用。按此处所指僧人翻刻本，盖即指南宋绍兴乙丑（十五年1145）浮屠宝达重刻此书于齐安郡学者。此本有晋陵许端夫所写的序，原因是他当时正做齐安郡守，此书刻于齐安郡学，故被请而序之。僧人宝达，是刘景文的孙子，而刘景文尝与苏东坡友善，足见亦名门之后。宝达虽落发为僧，却精于古文篆，故亲自摹写夏竦《古文四声韵》，上板鐫于齐安郡学。齐安属湖北黄冈地区，在宋代尚不是刻书名邦。加之是和尚篆书上板，故文字的准确程度及雕印水准，均不能和当时的浙江、四川，福建、江西所比拟。故吾丘衍谓此本不可用。今此本仅存一卷，藏于北京图书馆。民国六年（1916）尝为袁克文所购藏，并写下了鉴定错误、褒奖错误的跋文：“《集古文韵》宋槧残本，存上声卷第三一卷，即夏竦所著《新集古文四声韵》。夏为宋庆历时人，字子乔。书原五卷。汲古阁毛氏谓世无其书，曾从文渊阁原本钞出。清乾隆时，汪启淑得毛氏影本，遂以重刻。又《天一阁书目》有绍兴乙丑浮屠宝达重刻本，即吾衍所谓僧翻本，今已早佚。文渊原本亦渺焉无闻。顷于柳蓉邨书友处获觐此册，诧为奇珍，因以百金易归。此书刻画苍赭，当是北宋原本。即补版，亦必在南渡初年。吉光片羽，宜为希世鸿宝。丙辰九月棘人

克文。”这段话想极力提高此残本的价值，故便贬低他本，或说他本久佚无闻。其实这个残本，根本就不是什么北宋原本，而恰恰正是元吾衍所说的那个“不可用”的绍兴十五年释宝达齐安郡学刻本。以这个残本与本文所介绍的宋刻本相应卷帙勘比，则信吾衍所言为不诬。

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刊本此书，为每半叶六行，白口，左右双边。而僧人宝达齐安郡学刻本，则为每半叶八行，白口，四周单边。两本明显不同。北图所藏此本卷一已佚，然以清抄本配补，仍有夏竦所作进书序。卷三首行顶格镌：“新集古文四声韵卷第三”；二行低二格镌：“开府仪同三司行吏部尚书知亳州军州事上柱国夏竦集”。元吾衍《学古编》所记“前有序并全御者好”，正此之谓也。按元吾衍以此本与僧人宝达绍兴十五年齐安郡学刻本相比较，则在表彰此本之后，紧接着便说：“别有僧翻本者，不可用。”这种口气反映出来北图所藏此本，其刻当在僧翻本之前，至少也与僧翻本同期梓行，而绝不会晚于僧翻本。前边已经知道，吾衍所谓的僧翻本，实际就是南宋首帝绍兴十五年（1145）僧人宝达齐安郡学刻本。而与其同期付梓，甚至更早一些时候镌板的北京图书馆这个藏本，其雕印时期亦当在南宋初年，或更早一点。此本既无牌记、序跋可资借镜，又无讳字、刻工可供参改，其版本改订只能做出如上的表述。

此本每卷末钤有“沈与文印”、“姑馀山人”、“雁里草堂”诸朱记。又钤有“恬裕斋藏”、“瞿氏鉴藏金石记”印记。沈与文字辨之，明嘉靖时吴县人。《士礼居跋·邹氏闻见录》云：“吴中杉渚桥嘉靖时有沈与文，颇蓄书。”其藏书处曰雁里草堂。又自号姑馀山人。此书经他收藏，足见早在明朝已被珍重。此后几百年间辗转流传，最后归入瞿氏恬裕斋和铁琴铜剑楼。恬裕斋是铁琴铜剑楼的前身。足见此书在铁琴铜剑楼亦珍藏多年。《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七谓是书“题开府仪同三司行

吏部尚书知亳州军州事上柱国夏竦集。阙第一卷上平声廿九韵，钞补全。”足见此本在进入铁琴铜剑楼之前，第一卷已佚，并已有抄补配齐。又谓“此书宋本难得，汲古阁毛氏仅有影宋抄本，歙汪氏得而刻之。其篆书笔画微有不同处，因抄致讹也。”又透露出乾隆时汪启淑据以重刻的祖本——汲古阁影抄宋本，其影写的底本，似与此本为相同版本。而汲古阁是从文渊阁原本影写抄出，可见政府公藏当中亦有此本。今北京图书馆所藏虽首卷为清人抄配，并非全是旧观，然就是这个残本，亦是《古文四声韵》传世最早的刊本了。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

梁启超与《义乌吴氏宗谱序》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曾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过著名的“戊戌变法”，是一位领时代政治风骚的风云人物。同样，他的文章也曾在近代文学史上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郭沫若先生在《少年时代》中称赞梁启超是“二十年前的青少年……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

在义乌市东河乡益公山村村民吴功佐保存的，于民国甲子年（1924）重修的《延陵吴氏宗谱》里，使我们有幸目睹这一位文学大师的文章风采，并为研究梁启超与义乌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梁启超写的这篇文章位于《延陵吴氏宗谱》卷首第一页，题为《义乌吴氏宗谱序》，作于民国十四年（1925）二月十六日。全文约1000多字，可分为二大部分，第一部分首先从历史的角度，以分析北朝、南朝时期谱牒兴盛原由为例，说明谱牒之学的重要性，第二部分称赞了义乌吴氏家乘源远流长，记载详明，并说“阐扬世德，以风天下者耶，此又非独一人一姓之事云尔。”

本文结构紧凑，“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读者别有一种魔力。”（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文字清典，明白如话，体现了他倡导的“新文体”的语言特色。

• 傅 健 •